

中國文學流派精品賞析叢書

塞漢雄魂

劉琦
周奇文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文学流派精品赏析丛书

塞 漠 雄 魂

——边塞军旅诗派精品赏析

刘琦 周奇文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Saimo Xionghun

塞漠雄魂

刘琦 周奇文 著

责任编辑:吕海江 徐潜

封面设计:徐潜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4 插页 28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印数:1—6 000 册 定价:15.50 元

ISBN 7—80626—103—6/I·13

前 言

在姹紫嫣红的中国古典诗歌百花园里，边塞军旅诗可谓一枝根深叶茂、色异味别的奇葩。

说到边塞军旅诗，人们都习惯地认为它是唐代、特别是盛唐的专利品。实际上早在先秦时代它已经植根萌芽、而且开花结果了，《诗经》中的不少诗篇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所以，如果要描述边塞军旅诗的发展史，先秦时代所产生的、现存于《诗经》中的边塞军旅诗当然是它的源头。

《诗经》中的边塞军旅之作，内容已相当丰富。如《小雅·出车》、《六月》分别描写南仲、尹吉甫奉周宣王之命北伐猃狁的事迹；从战争形势的严峻，战备的紧张心理，写到出师的盛况，怀归的心理，以至凯旋归来与家人团聚的欢乐。而如“出车彭彭，旂旐央央”的描写，使我们自然想起高适“捩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燕歌行》）的情景；“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岂不就是李峤“奉诏受边服，总徒筑朔方”（《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之所从出吗？《小雅·采薇》对戍边作战的苦况、战事的频繁、军容的威武、尤其是强烈的思乡之情，都有较为具体的描写。《秦风·小戎》除盛赞了王师车马之盛、兵器之精以外，通篇三章

反复抒发了妻子思念久戍丈夫的心情。《卫风·伯兮》把妻子的相思描绘得更加婉曲细腻、深入具体。她赞美自己的丈夫为“邦之桀”(通“杰”),想象丈夫执殳前驱,气概英武,颇有骄傲之感。也正由此,相思愈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她无心打扮,因为丈夫不在,打扮好了又取悦谁呢?她甚至达到“首疾”、“心痛”的刻骨铭心的程度。《王风·君子于役》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情。这样,由边塞战争所引起的征夫思妇,离情别恨一类内容,成为历代边塞军旅诗相承的一大主题。《诗经》中有的作品,揭露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给社会带来的破坏、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人民对于战争的憎恨。如《唐风·鸛羽》就透辟地反映了由于“王事靡盬”而带来的“不能艺稷黍”、“不能艺黍稷”、“不能艺稻粱”的社会现实矛盾,联想到田园荒芜及父母不得事养的悲惨处境,心里极为悲痛。从而发出“曷其有所”,“曷其有极”,“曷其有常”的呼号,反映了他们要求过上正常安定生活的心理愿望及对戍边战争的厌恶与否定。这里所谓“王事”固然包括各种劳役,但主要的还是征戍,这从《诗经》中涉及战争时常提“王事靡盬”就是明证。《国风》中最早的诗《豳风·破斧》乃是参加“周公东征”的兵士所作,诗中写到久战归来武器残破的狼狈情况,也写到庆幸生还和痛定思痛的心情,流露对战争的憎恶,但却不曾有一字半句歌颂周公这位“圣人”的武功。《东山》相传为周公东征奄国时的作品,其中写到兵士久戍军中,田园荒废的情景:“果裸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疃鹿场,熠熠宵行。”《小雅·何草不黄》相传是

周幽王时的作品，当时征伐不息，征夫怨恨统治者把人不当人，驱使他们奔走四方。“哀我征夫，独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多么沉痛！以上这些诗所关涉的战争，除少数不可考者之外，都是统治阶级的内战和侵略战争，其为人民所憎恨是当然的。但是一旦遇到正义的战争，人民便踊跃参加，毫不踌躇，《秦风·无衣》就表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秦与西戎逼处，常受其侵扰。所以，抵御西戎乃是关系到民族安全的战争，这样的战争自为人民所支持。这种感情是时代群体意识的集中体现，表现出同仇敌忾、慷慨豪迈的精神气概。可见，《诗经》中的边塞军旅诗作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对当时社会作了广泛的透视。既有从军出塞、保国戍边的描写，也有报国壮志、反战呼声的抒发；既描写了重大的边塞战争、反映了军旅生活，也表现了征夫思妇的相思之情。总之，凡与边塞军旅生活相关者，《诗经》中的边塞军旅诗都有所涉猎。这样丰富的题材在边塞军旅诗的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为历代边塞诗所继承。

屈原的《楚辞》中仅有的一篇表现战争场面的诗《九歌·国殇》，是一首追悼为国牺牲的将士的挽歌。它以激越的感情，壮烈的战斗场面描写，歌颂了楚国卫国将士们的英雄气概。这是一首充满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的诗篇，读来深沉悲壮，激励人心。《国殇》的风格刚健质朴，雄浑悲壮，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首诗对后代边塞军旅诗中战争场面的描写很有影响，并奠定了边塞军旅诗悲壮的美学风格。

两汉时期，武功卓著，战争频仍。尤其是对匈奴的长期战争和经营西域的成就，不但对当时社会，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都有深远的影响。这个时期所留下来的边塞军旅之作虽然不多，但如汉乐府中的《上之回》、《战城南》，以及许多歌辞已亡佚的作品，如《陇头水》、《出塞》、《入塞》、《关山月》等等，却成了后代边塞军旅诗中常见的题目。《乌孙公主歌》、《李陵歌》、《匈奴歌》作为典故，常为后人所歌咏，也是可以看出其间的影响、承传关系的。尤其是《战城南》、《十五从军征》两首诗，非常真实具体、生动形象地反映出当时战争的残酷性、破坏性，流露出诗人强烈的反战情绪。《战城南》一诗所反映的战争，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概括的是一定时代的战争，而不是某一次战役的具体反映。这首民歌充分反映了汉乐府构思超脱、感情奔放、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特征，给后代诗人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垂示了光辉的典范。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战城南》、杜甫的《兵车行》都明显地受到此诗的启示和影响。《十五从军征》更是艺术上较为成熟的叙事之作。这首乐府民歌揭露汉代兵役制度的腐败与黑暗，为杜甫创作《垂老别》、《无家别》垂示的典范：从主题的选定以至细节的模写，在在都可以发现彼此之间承前启后的痕迹。而只有 42 个字的质朴无文的《古胡无人行》，被李白铺写成形象气韵丰满的长篇，又被贯休一反其意，写成反对穷兵黩武、歌颂仁政德化，具有崭新思想意义的篇章，则此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又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建安时期是边塞军旅诗的发展与提高时期。这个

时期最有价值、成就最高的也正是那些反映社会动乱、与战争有关的一些作品。这个时期的边塞军旅之作比起以前的作品来，一是在思想内容方面更加充实深刻，一是在艺术表现上更为细密完善。这个时期在边塞军旅诗的创作上成果最丰硕的要数曹操。他的《蒿里行》表现了汉末董卓之乱、军阀混战给社会所造成的惨象：“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明人钟惺称之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苦寒行》、《却东西门行》描写山路行军的艰苦或思乡之情十分逼真。而《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一章则通过着力渲染大海那种苍茫浑涵的气势，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胸襟，可说是一首描写边塞风物的写景诗。《冬十月》、《河朔寒》表现了北方寒冬时节的风物民情。钟嵘《诗品》云：“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敖陶孙《诗品》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正是他这类诗歌的主要特点。曹植的《白马篇》将游侠与边塞相结合，通过塑造一位武艺精绝，视死如归的“幽并游侠儿”的形象，寄托了自己希望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另外，“建安七子”及女诗人蔡琰等也都写过边塞军旅诗，如王粲《从军行五首》虽称美曹操“神且武”，但主要内容是表现从军的辛苦、社会的凋敝、怀乡思亲之情及抒发自己铅刀一割的心愿。全诗立言可谓得体，为后来杜甫的前后《出塞》一类作品开辟了先路。陈琳的《饮马长城窟》深刻地揭示了在长城从事繁重劳役的士卒的痛苦和愤懑不平。蔡琰的《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描写了诗人在战乱中被掳入胡的痛苦遭遇。建安时期的边塞军旅诗，在思想内

容上又有新的开拓：（一）表现社会乱离的景象；（二）抒发诗人渴望统一和建功立业的抱负，即诗中有诗人在；（三）开始有对边塞风物的描写。在艺术表现上：（一）继承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多用乐府旧题，表现现实内容，抒发感情怀抱。在这方面，曹操尤为突出。清人方东树称其“用乐府题目自作诗。”（二）叙事、抒情、描写更为曲折细腻，如曹植《白马篇》、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蔡琰《悲愤诗》及《胡笳十八拍》。（三）形成慷慨悲凉、刚健有力的美学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

两晋之时，边塞军旅之作颇见消沉，虽有一、二作者，亦只是建安诗人之学步，无甚新意。如张华《壮士篇》之模拟曹植《白马篇》，陆机《从军行》之模拟王粲、《苦寒行》之模拟曹操等。但无论张华，或是陆机，他们的诗里多喜用对偶句，注重语言的雕琢，离乐府民歌渐远，加强了文人化倾向，促进了诗格向格律体的发展。但西晋末的爱国诗人刘琨，深得建安真传，一篇《扶风歌》，清刚悲壮，被钟嵘称之为“善为凄厉之词，自有清拔之气。”（《诗品》）可见此时边塞军旅之作，仍不绝如缕。

南朝宋、齐两代，边塞军旅之作颇同于两晋，显得有些寂寞。但刘宋诗人鲍照却是在这一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诗人。《代东武吟》写一位征战一生，有功无赏、穷老还家的老兵报国无门的痛苦。对后世边塞军旅诗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如王维《老将行》、杜甫前后《出塞》都有《代东武吟》主人公的影子，而王昌龄的《代扶风主人答》从内容到形式，更酷似鲍照的这篇作品。

《代出自蓟北门行》热情歌颂了将士们誓死卫国的精神，而“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等句，深深地寄寓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感慨不平。《拟行路难》第十四首紧紧围绕征夫的悲惨遭遇，唱出了少壮从军、白头不还的绝望哀歌。这既是代征夫倾诉悲苦，实际上也反映了诗人自己对现实的激愤不平。《拟古》其三写幽并少年报国的愿望，象曹植的《白马篇》一样，抒发了诗人自己的理想。《代陈思王〈白马篇〉》一诗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思想感情。总之，鲍照这类边塞军旅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实际是诗人自己，内容既丰富深刻，感情也强烈奔放，近似于建安诗人的“梗概多气”。他这类边塞军旅之作多用五言乐府体，风格俊逸豪迈，奇矫凌厉，如“骏马轻貂，雕弓短剑，秋风落日，驰骋平冈。”（陆时雍《诗镜总论》）对李白、杜甫、高适、岑参都有影响。这里，试以鲍照和李白的两篇《代出自蓟北门行》略作比较：“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鲍）、“羽书速惊电，烽火昼连光”（李）；“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鲍）、“虎竹救边急，戎车森已行”（李）；“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鲍）、“明主不安席，按剑心飞扬”（李）；“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鲍）、“画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李）；“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鲍）、“途冬风沙紧，旌旗冻凋伤”（李）；“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鲍）、“收功报天子，行歌归咸阳”（李）。从这些诗句的鲜明对比中，不难看出，两诗的继承关系极为明显：不但主题相同，篇章结构基本一致，就是使用的词语、创造的意象亦何其相似乃尔！既可见出鲍照对李白的影响，也可见出李白对鲍照的学习

中有创新,这个时期,除鲍照外,如何承天的《战城南》、江孝嗣的《北戍琅邪城》等少数诗作,也颇有新意。

梁、陈时代,边塞军旅之作骤然复兴,并有蓬勃发展之势。其特点是以乐府旧题写边塞征战之事,可称之为边塞乐府。而且,这些边塞乐府的拟作者大都没有边塞军旅的生活经历,因此,他们的这类作品确乎可以称之为“拟作”。从曲题方面看,梁、陈边塞乐府所拟者为两大类:(一)古辞已写过边塞军旅者,如《从军行》、《白马篇》、《饮马长城窟》、《代出自蓟北门行》等;(二)古辞未写而梁、陈人用以写边塞军旅者,如《度关山》、《雁门太守行》、《陇西行》、《燕歌行》、《君马黄》、《陇头》、《入关》、《出塞》、《入塞》、《关山月》、《紫骝马》、《骢马》、《雨雪》等。梁、陈立国,不过 80 余年,但边塞乐府作者却有 30 余人,存诗近 100 篇。如再加上王褒、庾信,作品就更多了。其拟作较多者,有吴均(6 首)、沈约(4 首)、萧纲(9 首)、萧绎(5 首)、王褒(8 首)、张正见(11 首)、陈叔宝(9 首)、徐陵(6 首)、江总(8 首)等等。梁、陈边塞乐府虽与建安以来的传统及北朝乐府民歌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但它又形成自己独特的特色。最为突出的一点,便是将女性与征战联系起来,将闺阁与边塞联系起来。如柳恽的《度关山》:“长安倡家女,出入燕南垂。惟持德自美,本以容见知。旧闻关山远,何事总金羁。妾心日已乱,秋风鸣细枝。”从思妇着笔,通过写思妇对征人的怀念,从侧面烘托出战争的漫长及其带给人民的痛苦和悲伤。此类诗虽在《诗经》中略见一、二,但汉魏莫传,此时大量出现,

毕竟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与此相联系,在艺术表现上,梁陈边塞乐府善于细腻地刻划心理活动。如刘孝威《陇头水》:“从军戍陇头,陇水带沙流。时观胡骑饮,常为汉国羞。畔妻成两剑,杀子祀双钩。顿取楼兰颈,就解郅支裘。勿令如李广,功遂不封侯。”人物的心理活动是复杂的:“时观胡骑饮,常为汉国羞”,屈辱的现实激发了报国之志,此其一;“畔妻成两剑,杀子祀双钩。顿取楼兰颈,就解郅支裘”的目的在酬功封侯,此其二;“勿令如李广,功遂不封侯”,历史的教训往往是功多者不赏,每念及此,则有无限悲怆,此其三。外部描写相对减少,内心刻划相对增多,如此复杂的心理描写,前此颇为少见。又如徐陵的《关山月》,不直接写主人公的怀乡,却先写征战士兵——“客子”的“思妇高楼上,当窗应未眠”的想象。同时展开了两地相思之后,又重新把笔收回到“星旗映疏勒;云阵上祁连”的现实处境上来。这样从虚、实几个方面作了渲染以后,“战气今如此,从军复几年”的叹息所蕴含的厌倦、思乡和欲归不得的种种思绪,便显得十分强烈、鲜明,一曲三折,一唱三叹,艺术描写确实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可见,梁陈诗人实际上是运用了在写宫体诗中所积累起来的手段和技巧来处理边塞军旅题材。女性被写进边塞,使梁陈边塞乐府形成了哀怨纤巧的时代特征。因此,在梁陈诗人笔下,汉魏旧曲、南朝乐府和北朝乐府呈现出合流的趋势,或者说,宫体乐府与边塞乐府呈现出合流的趋势。这种合流对题材的开辟和境界的拓展是有贡献的,边塞军旅之苦与闺阁相思之怨,原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外有征夫,内则必有怨妇。

因此,把二者联系起来写,正是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及其与人民的痛苦之间的联系,从而大大扩展了边塞军旅诗的表现范围和艺术容量,为唐及唐以后的边塞军旅诗提供了一种新的体制和格调。

北朝乐府民歌,大致产生于十六国和北魏时代,后来传到南方,被梁朝采入军乐,保存在《梁鼓角横吹曲》中,现存歌辞约 60 余首。其中有的诗表现了北方边塞的景色和风俗,如著名的《敕勒歌》;有的描写了军旅内容,反映了北朝频繁的战争现象,如《企喻歌》、《木兰诗》等。这些当然是很好的边塞军旅诗。尤其是《木兰诗》,更以其故事的传奇性和完美的表现手法而赢得了千百年来广大读者的喜爱。

由南入北的诗人庾信,既有国破家亡之痛,又怀屈身事敌之耻,加之北方边塞风物和文学精神的熏染,使他在边塞军旅诗的创作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诸如《出自蓟北门行》、《燕歌行》、《拟咏怀》其七、其十、其十一、其十七、其二十六等作,情蕴深厚曲折,风格沉郁苍凉,语言又锻炼得很精致,显示出把南朝文学的工细技巧与北朝的慷慨悲歌结合起来的倾向。他喜欢用典,又讲究格律,一些短诗,写得更为清新自然。他初步融合南北诗风,既是南北朝最后一位优秀诗人,又是唐诗的先驱,对唐人的影响更为直接。

隋代的边塞军旅诗是颇有光彩的,如卢思道的《从军行》、杨素、薛道衡、虞世基的《出塞》等,都较为刚健遒劲,与庾信一样,共同透露出诗风转变的消息。

唐代边塞军旅诗的创作臻于极盛,成为中国文学

史上的突出现象。仅就数量说,《诗经》、《楚辞》、《乐府诗集》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收,隋以前涉及边塞军旅内容的诗篇,据不完全统计,共有 200 首左右;而有唐一代,则近 2000 首。唐代著名诗人大都写过出色的边塞诗作,佳制迭出。其内容丰富深刻,体裁风格多样,异采纷呈,美不胜收。

边塞军旅之作,正是初唐诗歌革新的一个重要实绩。“四杰”、陈子昂这些诗歌革新的重要人物,都创作了许多边塞军旅名篇。如杨炯《从军行》、陈子昂《感遇诗》38 首中的“苍苍丁零塞”、“丁亥岁云暮”、“朔风吹海树”、“本为贵公子”、“朝入云中郡”及《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送魏大从军》、《登幽州台歌》等。他所高倡的汉魏风骨,在这些诗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开元、天宝时期,革新运动成功,边塞诗大盛,涌现出一大批以此为长的诗人,文学史上称之为边塞诗派,其主要代表诗人有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等人。高适最著名的作品是《燕歌行》,这是一幅概括力极强的边塞生活全图,其中叙述、描写、议论、抒情并用,朝野官兵、战守行驻、山川物候、闺怨戍苦兼及,气势豪迈,感慨深沉,措词警策,佳句迭出。诗用古体,却又多借近体之法,对仗精美,声韵铿锵。岑参边塞诗最著名者是两“歌”一“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较之高诗,岑诗的个性特征更为显著。杜甫称其“好奇”(《渼陂行》),殷璠也说“岑参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河岳英灵集》)那“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走马川行》)的轮台之夜,那“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的塞外雪景,那“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轮台歌》)的豪迈行军,何等雄奇壮丽,令人神往!李颀亦擅长古体,尤长于七古。《古从军行》等作质量高超,流传广远。王昌龄的独特成就却是近体七绝组诗。尤其是他的《出塞二首》和《从军行七首》,气象雄浑,意境高远,后人难以企及。四人之外,王之涣、王翰、崔颢等,皆有名篇佳作传世。而山水田园诗派的领袖人物王维,同样是一位杰出的边塞军旅诗作者。李白、杜甫的边塞之作也都量大质优。中唐以后,边塞军旅诗的数量并未减少,在思想、艺术上不断有新的追求和探索。这一阶段最有代表性的边塞诗人是李益,他的诗反映了广大军士的边愁乡思。如《夜上受降城闻笛》、《从军北征》等,境界悲凉清远。中晚唐时期,较重要的边塞诗人还有卢纶、王建、张籍、杜牧、马戴、高骈、于濬、张蟪等人。比较说来,他们虽不像盛唐边塞诗派诗人那样专此为长,但却显示了时代风气的流变。就艺术风格看,唐代边塞诗亦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初唐边塞诗的主导风格是郁勃。这种郁勃特色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于强敌入侵的愤然抗击,一是对于时事政治的喟然长叹。前者的代表是“四杰”,后者的代表是陈子昂。盛唐边塞诗的主导风格是雄豪。具体体现为盛大气象、尚武风习、自信观念和开创心理等时代精神特征。中唐边塞诗的主导风格是苍凉。国势衰落、战争多败,受降城已成历史陈迹,边愁乡思成为诗中突出的主题,凄凉哀怨色彩较浓。晚唐边塞诗的主导风格则是萧飒。色彩阴郁,景象悲苦,感情压抑、意绪低沉。初、盛、中、晚,

先后承革，形成了一条多姿多采的艺术画廊。

宋代积贫积弱的国力，对外战争多以失败、输币纳绢以求和而告终。如北宋对辽、西夏的战争，南宋对金、元的战争。最后，南北宋都亡于外敌入侵。所以，两宋的边塞军旅诗作为对外战争的反映，表现为悲愤沉咽。这从苏舜钦的《庆州败》、陈与义的《伤春》、陆游的许多军旅诗、纪梦诗、刘克庄的《军中乐》等诗中可以鲜明地体味到。有宋一代，除陆游外，极少有在边塞军旅诗领域取得象样成就的。陆游的边塞军旅诗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如《金错刀行》、《胡无人》、《成都大阅》、《关山月》、《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书愤》、《雪中忽起从戎之兴戏作四首》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这些诗，感情真挚，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是两宋唯一的一位边塞军旅诗大家。

金、元两代，除元好问的“丧乱诗”与萨都刺的一些描写北方边塞风情的作品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外，其他一些诗人，很少有在边塞军旅诗方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元好问的“丧乱诗”反映国破家亡的现实，既深刻又广泛，具有诗史的意义。清人赵翼《题遗山诗》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他这类诗，就艺术上的概括力和真挚凄切的感情而言，在杜甫之后是罕见的，不愧为当时一流诗人。

明清以降，边塞军旅诗呈现了一种新的趋势。作者的队伍有所扩大，但以边塞诗而著名的诗人都不多见。不过有一点却为前代所无，唐宋以来，是诗人写边塞诗，明代除开诗人之作外，是守边将帅写边塞军旅

诗，明代的两大边患，北方有蒙古族入侵，便有于谦；南方有倭寇为乱，便有俞大猷、戚继光。于谦一生写诗，可以称得上边塞内容的，大约有二、三十首之多，除开陆游之外，恐怕为唐人所不及。戚与俞所作，亦复不少。而郑成功所作《复台》诗，又开了近代与西方殖民者战斗的先声。

明代的边塞诗多写边塞生活，歌颂出塞之事，以为英雄壮举。因为明代对外战争获胜的并不多，直至明末，则又增加了诗人对东北边事的忧患意识。如陈子龙等。至于清兵南下，明末义士的抗清壮举，也多半通过军旅的斗争来表现。爱国主义情感上升为诗歌的主题。

清初有大规模的武功，如“十全”之类，从军者亦颇不乏人。但所写诗，多为无限歌颂，明主皇恩，天道浩荡，等等，其词则近谀，真正写边塞的好诗，很少出于名诗人之手。倒是清初的谪戍诗人吴兆骞写了好多抗俄内容的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清代后期，则有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奋起而抵抗，中英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连天的炮火与英勇的杀敌，每每在诗歌中得到反映。资产阶级的改革家梁启超出于改革的需要，曾高唱“诗界革命”，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提倡有“尚武”精神而又有关“国运升沉”的有“发扬蹈厉之气”的军歌。他不仅自己写了《易水钱荆卿》那样激动人心的军歌，还大力宣传黄遵宪所作《军歌》，认为它“精神雄壮、活泼、沉浑、沉远”、“读其诗而不起者必非男子”！黄遵宪也因此被称为“诗界革命”三杰之一。继之而起的南社革命诗人们，更纷纷以从军边